

第十二章 国士高风倾万世(二)

《张伯驹十五讲》

作者 张恩岭

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

(接上期)

1970年,张伯驹从长春回到北京,恰好见到了当年购买《游春图》的中间人马宝山,他就问马宝山30两金子的欠款怎么办。马宝山听了大笑,说,形势变了,对方完了,我也完了,你也完了,这事全完了。说得张伯驹也笑了。

你看,1970年距1946年,已经过去了24年,张伯驹也是劫后余生,按常情来说,这么久了张伯驹也该忘记这件事了,再说《游春图》也早归了国家。而且1970年时,张伯驹已是一贫如洗,在北京过着漂泊的生活,却还偏偏记着这件事。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,也可以说张伯驹有些“书生气”,但从这一细节上,我们恰恰可以看出,诚信是金,张伯驹的人品比黄金还贵重。

第二个特别的例子,就是张伯驹被划为右派以后,曾给陈毅元帅和刘海粟先生说过的两段话,更是出人意料,赤心可鉴。

1961年,张伯驹临去长春前,见到了陈毅,陈毅这时才知道他被划为右派的事情,就问他:“关于右派的事,有些想不通吧?”张伯驹却老老实实地说:“此事太出乎我的意料,受些教育,未尝不可,但总不能那样超脱,做到无动于衷。在清醒的时候也能告诫自己:国家大,人多,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,也算不了什么,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,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?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。”

张伯驹就是这样,受了这么大的冤枉,却还在为别人着想,为别人解释、开脱。人常说,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,张伯驹却是以君子之腹度别人之心,这不是赤子之心的体现是什么呢?

1978年,张伯驹在大连棒槌岛与刘海粟结邻而居,再次谈起被划为右派之事,刘海粟问他戴上右派帽子有什么感想,张伯驹苦笑一阵,说:“戴什么帽子,我倒无所谓。一个渺小的凡人,生死得失,无关大局。但说我反党,实在冤枉。而且担心老张献出这么多国宝,换了一顶‘铁冠’,传到海外,对党的威信不利。”

这就是张伯驹,自己受到那么不公平的待遇,想到的却不是自己,而是国家,是党的威信。这种胸怀真可谓感天动地,这是何等的善良天真啊!他真是胸中无半点机心,这就是赤子之心。

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,张伯驹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屈辱和折磨,但张伯驹被平反之后,对过往的一切屈辱遭遇毫不计较,当国家需要他们这些书画家作画为国家换取外汇时,他欣然接受;当祖国需要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名望,多与在台知名人士联系时,他又积极响应。所以,有人说,张伯驹的精神和风骨是近世以来少有的。张伯驹的胸怀正是儒家精神“仁”的体现。张伯驹胸襟宽阔,虽处逆境,却能随遇而安,既不

顾影自怜,也不嫉恨别人。

在反右运动中,京剧演员钱宝森批判他的时候,有些过火言辞——其实这也怪不得钱宝森,那时人人自危,人们也只好以假积极求自保。后来,钱宝森去世,张伯驹托人带去100元赙仪,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,一般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不过10元左右。有人劝他不必给这么多,意思意思就行了,但张伯驹坚持送这么多,说,当初他帮我打把子练武功,我们的交情还在。

还有一个例子更可以说明张伯驹人格的伟大。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忠义节操,就是对朋友要有情有义,要忠诚,不要因朋友的荣辱毁誉而变节。张伯驹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当朋友蒙尘落难,门前冷落,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候,张伯驹却不避嫌,甘冒风险毅然送上作为一个朋友的情义和关怀。

张伯驹的这个朋友就是章伯钧。章伯钧是全国著名的民主人士,曾是中国民主党派民盟的主要负责人,新中国成立后曾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,全国政协常委、副主席,交通部部长等职。1957年,章伯钧被打成右派,但又被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职位,“文革”中忧愤成疾,病逝于北京。直到1980年,他的所谓“罪行”材料才被推倒,他的骨灰也终于被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张伯驹也是民盟成员,和章伯钧认识且是朋友,只是交往并不多。1961年张伯驹夫妇出关长春前夕,曾去和章伯钧话别。这时候章伯钧才知道张伯驹要去东北,但工作尚未安排好,就答应张伯驹,要托自己在吉林的朋友关照张伯驹,张伯驹很受感动,认为章伯钧是个真君子。

1969年5月,章伯钧去世了,当时正处“文革”高潮,自然没人前往吊唁,人们唯恐避之不及。但这个时候,张伯驹却来了。

张伯驹在东北也早已是落难之人,只是当时回京看病,才知道这个消息的。

张伯驹和夫人是徒步去的,先是找到章伯钧原来住的地方,人去楼空,一打听,早搬走了。无奈,便托人找到地安门大街一家古董店的店员老樊,又托他去打听。老樊去农工党北京市委员会,假托要核对章伯钧生前所欠账目,才打听到了章伯钧遗孀李健生新搬到建国门的地址。

张伯驹叩开李健生家的大门,倒使李健生大吃一惊,赶紧把张伯驹、潘素拉进家门。几年不见,张伯驹身体已不如前,头发白了,脚上穿的布鞋满是泥土,从地安门到建国门,一个七旬老人走了多少路啊!

张伯驹气喘方定,徐徐地对李健生说:“对伯钧先生的逝世,我很难受,我虽不懂政治,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。他不以荣辱待己,不以成败论人。自己本已不幸,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恻,是个大丈夫。所以,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。今天,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,自己已是有心无力。”

“张先生,快莫说这些。伯钧相识遍天下,逝世后的慰问者,你们夫妇是第一人。此情此义,重过黄金。伯钧地下有知,当感激涕零。”话说到此,李健生已是泪流满面。

的确,张伯驹就是这样一个拥有赤子之心的人,他不因“阶级斗争”的特殊氛围而计较个人利害,他是一个从来不因政治气候而改变操守和信念的人,他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。

坦荡胸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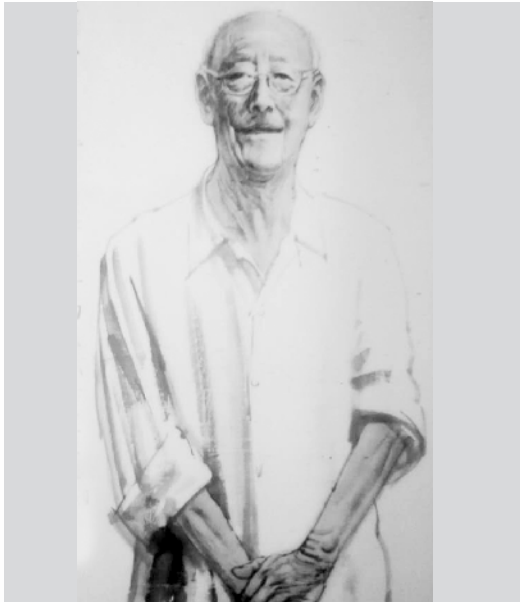
张伯驹为人正直,胸怀坦荡,敢作敢为,那是出了名的,冯其庸先生说他“是一个无半丝虚伪造作,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真人……他胸中无半点机心,也就想不到别人会有坏心”。

吕大龙先生在《张伯驹在长春的岁月》一文中说

得更有意思,他说:“张伯驹纵有足够的学识,却缺少起码的狡诈……”

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。例如,“文革”中张伯驹写了一份“交代”材料,其中一条是交代对毛主席的态度,他这样写道:“拥护毛主席不彻底,从封建主义的《资治通鉴》出发,在西安听说毛主席还看《资治通鉴》,心里很高兴,不似工农兵拥护毛主席从热血出发,比爹娘还亲,还是世界观根本问题。”

这个“交代”很老实,很坦白,叫人相信是真的。在“文革”期间,谁敢这样交代啊?哪个人不是每天高喊着“无限忠于、无限信仰、无限崇拜、无限拥护”的口号啊,像张伯驹这样交代,其实是越交代越要受批判的。在别人看来,张伯驹这个“交代”太傻,实际上,对于张伯驹来说就是实话实说,襟怀坦荡。



张伯驹画像

在张伯驹心里,文化至高,艺术至上,他是一个彻底的文人,他的心中没有世故,没有任何私心杂念,更不会算计别人,任何世间的烦恼一遇到文化艺术,都被他忘却了。

就说那一年张伯驹和潘素从吉林乡下回来,农村不收,北京又没户口,不正是处于“走投无路”的困境吗?心情不知该多沉重呢!可他呢,与夫人潘素取道天津下车,早晨6时许,来到张牧石家。张牧石一打开门,赶紧把张伯驹让到屋里,却不知院门外还站着张伯驹的夫人潘素,等着张伯驹安顿好后叫她呢。就这样,张伯驹坐下后谈诗词,谈京剧,高兴极了,差不多一个小时了,张伯驹才想起来,外面还有人呢!张牧石赶紧出去一看,潘素还在那儿站着,行李不多,在地上放着,人被冻得直哆嗦。

张伯驹谈起诗词,谈起京剧来,岂止是忘了潘素,“文革”中罗织的各种罪名,兜子里揣着不给落下的户口、退职证,投亲靠友不成等烦恼一概抛到脑后,只要一见到能与其谈词侃剧之友且畅谈起来时,他就会顿时进入一种兴高采烈、异常执着的情绪之中,其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任凤霞女士曾说过,对于张伯驹来说,“在他那里,谈词侃剧真正的意义已非词语的表面,那里有一种境界,没有什么能阻碍他进入那种美好而妙不可言的境界”。难怪一些名家发出高度的共鸣,“中国只有一个张伯驹,不能再产生第二个”。周汝昌先生更是评价张伯驹“是中国文化史上难以逾越的孤峰”。

(未完待续)